

河南大学教育科学博士文丛

重构中学 与大学的关系

CHONGGOU ZHONGXUE YU DAXUE DE GUANXI

美国进步教育之“八年研究”初探 杨捷◎著

河南大学教育科学博士文丛

重构中学 与大学的关系

CHONGGOU ZHONGXUE YU DAXUE DE GUANXI

杨捷·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重构中学与大学的关系: 美国进步教育之“八年研究”
初探/杨捷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6
(河南大学教育科学博士文丛)
ISBN 978 - 7 - 5004 - 6912 - 4

I. 重… II. 杨… III. ①中学—教学研究—美国②高等学校—教学研究—美国 IV. G639.712 G649.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59568 号

责任编辑 丁玉灵
责任校对 修广平
封面设计 王 华
版式设计 王炳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980 1/16

印 张 13

插 页 2

字 数 203 千字

定 价 25.00 元

《河南大学教育科学博士文丛》

顾问委员会

(按姓氏笔画)

丁 钢

林崇德

凌文辁

田正平

杨治良

黄希庭

劳凯声

陈玉琨

沈德立

顾明远

《河南大学教育科学博士文丛》(第二辑)

编 委 会

主 任：赵国祥 王北生

副主任：刘志军 程秀波 刘济良

成 员：(按姓氏笔画)

丁桂凤	王明辉	王恩国	叶平枝
吕云飞	许远理	刘金平	李永鑫
李桂荣	汪基德	杨江涛	杨 捷
范丽恒	林德全	赵俊峰	魏宏聚

《河南大学教育科学博士文丛》

总 序

近些年来，获得博士学位的人越来越多。他们的论文大多是有一定学术水平的。当前教育专著众多，或是某某丛书，或是某某文库，正可谓目不暇接。有时教育界出现一个新口号，人们还没有弄清它的含义时，丛书就已问世。这些专著除了个别确有较高学术水平者外，大多只是文抄公的水平。所以，我是比较看重博士论文的。因为博士论文总是要经过导师的指导，教授的评议，答辩委员会的评审质疑，经过这几个关口，质量总体上是有保证的。有些优秀论文对某个问题的研究还有所深入，有所创新。我每年都要参加多次评阅和论文答辩，从中收获不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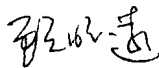
论文写出来以后总是要让人阅读的，才能将作者的研究成果传播出去，得以应用。但是大多数博士论文往往被束之高阁。由于科研经费的短缺，出版社不可能将所有博士论文出版问世。因此，许多论文中的学术高见不能为世人所知。有些研究生在研究过程中也很少到版本图书馆去查阅已有的论文，因而往往出现重复的研究。这都是很大的资源浪费。

河南大学投入资金，为学校教师中获得教育学博士学位者出版他们的博士论文，正是一桩善举。既使他们的研究成果为世人所知，真正充实教育理论宝库，又是对青年教师的极大鼓励，也是对教育理论界的一大贡献。

学校为教师出版著作，实是学校学科建设、文化建设的重要举措。大学者，不是地盘之大，也不在于学生之多，而在于有大学的文化。它表现在多个层面，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学术氛围和学术成果上。出版教授文库、博士文库等就是铸造大学的学术文化。

今年4月我有幸应邀到河南大学讲学，看到河大古朴的校园，听

到清晨校园中莘莘学子朗朗的读书声，深为河大的校园文化所感动。又得知学校为教育学院的博士出版博士论文，更感欣慰。特写以上几句话，是为序。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appearing to read '任以志' (Ren Yizhi).

2004 年 4 月 29 日于北京求是书屋

序

即将付梓的《重构中学与大学的关系——美国进步教育之“八年研究”初探》是杨捷博士在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改完成的一本专著。作为他的博士生导师，我为自己学生学术研究成果的出版感到由衷的高兴，并欣然作序。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的教育发展来讲，中学与大学的关系都是整个教育阶梯上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如何看待这个关系？如何处理这个关系？这不仅会对中学教育产生无法抗拒的影响，而且也会对大学教育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20 世纪初期，美国教育界就面临着中学与大学关系的问题。在进步教育协会的支持和组织下，一些具有教育革新精神的教育家在 30 年代进行了一次有关中学与大学关系的长达 8 年的实验，旨在协调中学升学和就业的双重目标。这就是举世闻名的“八年研究”（1933—1941），亦称为“三十校实验”。《重构中学与大学的关系——美国进步教育之“八年研究”初探》一书正是对这次实验的系统研究。尽管“八年研究”在我国教育界不算陌生，但对它的了解并不深入，更谈不上系统的研究。在这个意义上，杨捷博士这本专著的出版具有很大的学术价值。

在构思与撰写《重构中学与大学的关系——美国进步教育之“八年研究”初探》一书的过程中，杨捷博士收集并梳理了大量的第一手英文资料。尤其是对当时负责“八年研究”的中学与大学关系委员会的最后五份实验研究报告的分析，使他对“八年研究”的系统研究不仅占有了翔实的资料基础，而且具有了全面的思考视野。作为一位已有一定教学和研究经验的学者，杨捷博士在史料研究上确实花了很大的精力，特别是在对资料的驾驭上更见功力。

从《重构中学与大学的关系——美国进步教育之“八年研究”初探》全书来看，杨捷博士从历史背景、启动、实验活动以及跟踪研究四个方面对“八年研究”进行了深入而全面的研究，既有教育理论的阐述，又有教育实践的剖析。书中还运用了很多图表，这对整个论述也起到了很好的辅

助作用。整个研究采用了叙事研究和问题研究相结合的方式，突出了问题意识以及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使得人们对“八年研究”——美国现代教育史上一次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和组织最严密的教育实验活动能有一种立体的和全方位的认识。在“结语”部分，杨捷博士又简要而精辟地对“八年研究”的特点、评价、贡献和启示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在对“八年研究”的系统研究中，杨捷博士不仅对一些有关“八年研究”的误解进行了澄清，而且在一些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更重要的是在一些方面还有了新的发现。这里试举一二例。我国教育界一直认为“教师专业发展”（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在西方国家是20世纪60年代开始和80年代盛行的，但是，杨捷博士的研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美国教育家早在“八年研究”中就提出了“教师专业发展”的观念，强调通过学校的变革来促进教师的成长；同时还提出了教师专业发展的途径和方式，增强教师的自信和增加教师的经验。这一观点，把原先认为的西方“教师专业发展”肇端的时间往前推了二三十年。

在我国，这一二十年来，中学与大学的关系问题一直是教育界乃至整个社会都十分关注但至今又未能很好解决的问题。毋庸置疑，这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制约我国教育发展的一个瓶颈。它实际上也是我国教育界很多矛盾与问题产生的症结所在。从美国教育历史发展来看，在“八年研究”之前，美国的中学毕业生须通过全国性统考进入大学；但在“八年研究”之后，不仅形成了新的教育评价理论，而且开始取消了全国性统考，因而改变了中学毕业生进入大学的传统方式。仅就这一点而言，美国的“八年研究”在不少方面能给我们提供借鉴的经验和有益的启示。正因为如此，《重构中学与大学的关系——美国进步教育之“八年研究”初探》的出版也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也许，其在实践中的现实意义要超过在理论上的学术价值。我相信，凡是对我国中学与大学关系上的矛盾和问题予以关注的人，肯定能从杨捷博士的专著中有所收益。此外，还有一点是应该指出的，那就是，“八年研究”所开创的现代教育实验的范式向人们展现了一次真正意义的学校教育实验，这对我国教育界方兴未艾的学校实验活动无疑会有示范的作用。

杨捷博士在硕士学习阶段曾师从我国外国教育史和比较教育学界的老前辈孟宪德教授，这使他打下了较为扎实的学术基础。此后十多年，他一直从事专业教学和研究工作，这又使他积累了丰富的专业教学经验和拓宽了广泛的专业知识基础。尽管杨捷博士在学期间喜欢称自己是“迟到”的

学生，但正是他原先扎实的学术基础和长期的教学研究经验在很大程度上为他攻读博士学位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并使他具有较宽泛的学术视野、较扎实的学术功底、较敏锐的学术眼光以及较深刻的学术见解。这在他的《重构中学与大学的关系——美国进步教育之“八年研究”初探》一书中得到了体现。

在攻读博士学位的3年中，杨捷博士非常刻苦认真，潜心学习研究。除了很好地完成一些课题研究外，他还在全国核心期刊上独立发表了十多篇论文。在答辩时，他的博士学位论文也得到了答辩委员会成员的一致好评。这是对他的博士学位论文的肯定，更是对他的学术精神和学习努力的肯定。生命有涯，学术无涯。我期盼杨捷博士在自己的学术道路上能够越走越宽广，所取得的学术成果能够越来越丰硕。

单中惠

2006年12月10日

导 言

西方历史学家指出，人类如果要知道往哪里发展，首先必须知道曾经到过哪里。历史不是一件约束物，它不能束缚现代人的思想，但历史可以表明现代社会的演变轨迹，可以说明这样一个真理：如果人类对自身历史演变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时，它就不可能真正理解现代社会的形式和结构。

“进步教育”（Progressive Education）是20世纪美国教育史上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且范围最为广泛的一种教育革新思潮，它是理解美国社会、教育、文化乃至历史的“不可逾越的基石”^①。虽然进步教育运动早已衰落和解体，然而“美国没有一所学校完全逃脱了它的影响”^②。正因为如此，进步教育及其教育实验活动一直是中外教育理论和教育史研究和探索的重要内容。

“八年研究”（the Eight - Year Study）是20世纪30年代由美国进步教育协会（PEA）发起的一项大规模教育实验，目的在于通过实验建立中学与大学的有机衔接，协调中学升学与就业的双重目标，验证或确立进步教育所提出的教育目标，以期建立新型的中等学校模式；同时也为了证明在整个学校教育系统中推行进步教育理念和实践的可行性与合理性。

一 选题意义

本书的研究目的是试图较为全面地探讨“八年研究”的全貌，追踪其发生、发展的历史轨迹，分析这项实验研究的原委、意义和影响，为我国教育理论界和外国教育史领域全面了解“八年研究”提供更多的认识空间和思考纬度。

① 吴式颖、任钟印主编：《外国教育思想通史》第九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08页。

② 克雷明著：《学校的变革》，单中惠、马晓斌译，上海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355页。

“八年研究”在美国教育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探讨“八年研究”是进一步了解进步教育的关键节点之一。在进步教育所开展的一系列实验活动中,“八年研究”是组织最为周密、实验内容最多、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为庞大、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次教育实验活动。进步教育协会发起和组织这项实验研究的年代正值进步教育兴盛和危机的交汇之处,进步教育的思想基础、价值取向、核心理念以及社会影响力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通过对“八年研究”的深入了解有助于全面认识进步教育的演变过程和兴衰的原因,从而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美国教育的发展与特点。

对“八年研究”的研究可以还原实验研究的本真,正确地了解和认识“八年研究”的历史史实、内涵和意义。目前国内对“八年研究”的介绍主要是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是从外国教育通史的角度简要介绍这项实验的一般概貌。从所阐述的内容和呈现的信息来看,相关问题基本局限于国内翻译西方教育著作中的零星资料,且大同小异,资料来源较为单一,明显缺乏第一手资料。^①其实,“八年研究”的五卷最终实验研究报告是这项实验的最权威和最基本的资料,有2160多页的原始文献,内容极其丰富。另一方面是近10年来对课程开发和课程理论的研究涉及“八年研究”,研究视角无一例外均以其中的课程改革、核心课程为重点,特别是强调有“现代课程理论之父”之称的拉尔夫·W. 泰勒(Ralph W. Tyler, 1902—1994)在“八年研究”中的作用,甚至把这次实验研究直接称之为“‘八年研究’课程实验”^②。这显然是看待问题的角度和侧重点不一样。但总的来说,目前对“八年研究”的探索还基本上处于片断的描述阶段,与这项著名实验研究所蕴含的价值和历史地位远不相符。

由于1942年“八年研究”实验报告的发表恰逢美国全面介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际,加上战后保守主义的抬头,美国社会和教育界对实验研究的发起者——进步教育协会进行了猛烈批判,使得“八年研究”所取得的各项成果以及可能产生的积极影响都未能及时发出它本来的声音。但是,无论在美国教育史上,还是在课程发展史上,“八年研究”都是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教育实验研究。对中等教育的发展,尤其是对中学与大学关系

^① 据笔者查阅,国内介绍“八年研究”的资料主要来源于澳大利亚教育史学家W. F. 康内尔所著的《20世纪世界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张法琨等译)、美国教育史学家克雷明所著《学校的变革》(上海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单中惠、马晓彬译)中关于进步教育或“八年研究”的论述部分。

^② 杨汉麟主编:《外国教育实验史》,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08页。

的协调,“八年研究”曾提出了许多值得重视的建议和观点,进行了诸多建设性的有益尝试,引发了人们进一步的思考。因此,“八年研究”是一个应该重视和必须全面探讨的课题。

本书选题试图对“八年研究”的背景、过程、内容及其影响进行探究和评析,以期引起人们对该项实验研究的重新认识,并借他山之石,吸取一些有益的经验,促进我国中等教育的改革,尤其是促进中等教育目标的改革,构建中学与大学的良好合作关系,也为目前在我国如雨后春笋般开展的各类教育实验活动提供借鉴。

对“八年研究”进行研究的意义主要表现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

从理论上来说,论文选题有助于拓展和深化当前的外国教育史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领域试图突破已有的研究范式,即从传统的宏大叙事向问题研究转变。具体来说就是,传统的外国教育史研究主要侧重于对外国教育发展历程的纵向贯通式的研究,力图对从古至今外国教育发展过程中的各种思想、制度进行梳理和分析,尤其注重对西方教育发展规律和总体轨迹的把握与探索。然而,随着外国教育史学科研究水平的提高以及研究取向的转变,学科领域研究正日益趋向以问题研究为主,侧重于对外国教育历史发展某一时期或某一重大事件、思想或思潮、教育制度的转变与成因等进行跨学科、综合化的考察和专门研究。本书选题以20世纪美国的“八年研究”为考察对象,有助于更好地认识美国教育,特别是美国中等教育的嬗变,深化美国教育史的研究。

从实践上来说,论文选题对目前的教育研究与实验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可以为各种各样的教育与实验提供一个可供参考的范例,有助于更好地展开教育实验的步骤、充分发挥实验的功能以及科学有效地运作。本书选题对我国中等教育发展的实践具有直接的借鉴和启示意义。当前我国中等教育的普及率愈来愈高,中学毕业生就业和升学的矛盾一直困扰着各级政府、教育管理部门和教育理论工作者,论文对“八年研究”的探讨无疑会提供一个具有可比性的借鉴对象。“八年研究”是一项历经12年之久的系统的、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的实验研究,取得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成果,其背后所蕴藏的对教育实验研究的坚定信念,无疑会给人以深刻启示。譬如,“八年研究”产生的教育评估理论告诉我们,科学的评估方式必须是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八年研究”试图改革传统的大学入学考试,尝试大学根据中学的推荐和学生在校综合表现记录招收新生的做法,动摇了高等学校入学考试的根基。这些都对我国

改革以“升学率”为目标的中等教育模式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实践意义。

二 文献综述

(一) 中文文献

总的来说,国内对美国“八年研究”的探讨主要散见于外国教育史研究和其他教育学科领域的专门研究之中。笔者在国内中文文献著作中所见到的最早的、较为集中介绍“八年研究”的资料是赵祥麟主编的《外国现代教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书中概要地介绍了“八年研究”的基本情况,使许多从事教育理论工作的专业人士和教育学专业的学生对“八年研究”有了初步的了解,笔者就是通过阅读该书第一次接触到“八年研究”的。从该书的引文和表述来看,主要参考了康内尔(W. F. Connell)所著的《20世纪世界教育史》(*A History of Educa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World*)和克雷明(Lawrence Arthur Cremin, 1925—1990)所著的《学校的变革》(*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chool*)英文版,为国内研究现代外国教育史,特别是美国教育史增添了新的内容,这两部原著的中文版也分别于1990年和1994年与读者见面。在此后的20多年中,它们一直是国内探讨“八年研究”引用最多和最直接的资料来源。

1989年,由滕大春主编的《外国教育通史》(第五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较为清晰地介绍了“八年研究”的主要内容,重点阐述了实验研究中的课程改革和评估理论;1990年由瞿葆奎主编、马骥雄选编的《教育学文集·美国教育改革》中收录了艾金所撰写的“八年研究”第一本实验报告的部分节选(徐继清译),这是国内第一次出现有关“八年研究”实验报告的原始资料文献,为全面了解实验研究结果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施良方在美国课程论专家泰勒(Ralph W. Tyler, 1902—1994)所著的《课程与教学的基本原理》(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一书中撰写了题为“泰勒的《课程与教学的基本原理》——兼述美国课程理论的兴起与发展”的专门介绍,从美国课程理论发展的角度,将“八年研究”作为泰勒课程理论产生的实践背景进行了针对性的阐述,引用了“八年研究”实验报告的相关资料,将泰勒的课程理论看作是实验研究的主要成果;1997年张斌贤在《社会转型与教育变革——美国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一书中,详尽介绍了美国进步教育,其中单独介绍了“八年

研究”的始末，特别是分析了进步教育不同时期教育实验的特点，为笔者思考“八年研究”在进步教育实验中的地位和特点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也为论文选题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和切入点；由吴式颖主编的《外国现代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和《外国教育史教程》（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也介绍了“八年研究”的基本情况，尤其是后者作为高等教育国家级重点教材已成为国内使用最广泛的、最受欢迎的外国教育史教材，无疑对人们了解和认识“八年研究”起到了很好的作用。除此之外，国内其他有关外国教育史或专题史著作也包含篇幅有限的介绍，有的课程理论和教育评价理论方面的著作也屡次提到或简要概述了“八年研究”的概况。但绝大部分因研究对象或目的的原因，仅限于一般性的介绍。在本书即将完成之际，由杨汉麟主编的《外国教育实验史》（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面世，书中以“‘八年研究’课程实验”为标题较为清晰地梳理了整个实验过程，但遗憾的是笔者没有看到所期望的新资料。

国内有关“八年研究”的资料文献还包括一些陆续发表的文章，其中有代表性的是：杨爱程的《美国课程研究史上的“八年研究”评介》（《课程教材教法》1987年第6期）；张斌贤的《“八年研究”始末》（《教育史研究》1996年第4期）；易红郡、王键的《美国“八年研究”课程实验述评》（《湘潭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杨光富的《“八年研究”的贡献以及对我国教育改革的启示》（《外国教育研究》2003年第2期），另外，还有一些以“八年研究”为题或以西方课程、教育评估理论为侧重点的文章也涉及论文选题的内容，在此不再一一赘述。总的来讲，这些论文没有超出以上著作所涉及的范围，大都是出自这些著作，或是介绍性的概述，或是对几本著作中“八年研究”内容的整理和重新编排。值得一提的是，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2002级硕士研究生吴艳的毕业论文《美国“八年研究”初探》（指导教师：单中惠教授）是目前笔者所看到的唯一一篇专门论述“八年研究”的学位论文。作者分别就“八年研究”的背景、过程和贡献作了相关介绍。就篇幅而言，这是国内目前已发现的有关“八年研究”最充实的一例，大约有2万余字，比以往的有关介绍更加详尽和全面，无疑是一篇较好的硕士论文，也曾让笔者为之期待和欣喜。但是，从整篇论文的内容和引文中可以看出，作者所掌握和搜集的相关资料还十分有限，基本局限在国内现有介绍和部分“八年研究”实验报告，对问题的分析和深入研究还值得商榷。

（二）英文文献

国外对“八年研究”的追踪基本上始于实验研究的结束。从一定意义上讲，“八年研究”实验报告本身就是对这项实验研究的自我评价和研究。1942年，负责主持“八年研究”的中学与大学关系委员会发表了实验研究报告。其中，艾金撰写的《八年研究史》（*The Story of the Eight-Year Study*）主要总结了实验研究的实施过程、基本内容、思想基础、中学改革与大学追踪研究的成果以及自我评价。该报告是记载实验研究过程的最重要文献，也被国内许多研究者所反复引用。

贾尔斯（Giles, H. H.）等人撰写的《课程研究》（*Exploring The Curriculum*）主要论述了30所学校（或学校系统）的实验革新工作，重点阐述了教育目标、教育内容、教育方法和教育评估之间的关系，分析了合作中学所开展的课程开发、教学计划、课堂实践、教育管理和教师专业发展等活动。

尤金·史密斯（Eugene R. Smith）和泰勒等人撰写的《学生进步的评估与记录》（*Appraising and Recording Student Progress*）主要介绍了在合作中学所开展的教育评估和评估与记录的手段、方式和方法，以及对学生在思维、社会敏感性、欣赏能力、兴趣、社会适应性等方面进行评估的步骤和方法，侧重于从技术角度阐述实验研究的内容。

迪安·钱伯林（Dean Chamberlin）等人撰写的《他们在大学里成功吗？》（*Did They Succeed in College?*）主要论述了大学跟踪研究的情况，详细描述了大学跟踪委员会对合作中学毕业生是否在大学成功所作的测试和评估，主要包括对诸如学术成绩、智能、活动、学生与社会、学生与教育的测试与比较以及个案研究、追踪结果、测试量表等。

中学与大学关系委员会组织汇编的《三十所学校自述》（*Thirty Schools Tell Their Story*）是由参加实验的30所中学（或学校系统）关于各自实验研究的总结报告，分别记述了中学开展实验的历程、主要内容、所取得的成绩和经验，为实施个案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这五本报告为本书研究提供了翔实的第一手资料，是研究“八年研究”最重要的依据和材料，也是完整再现实验研究过程的权威论据，所以也是本书完成的基础。从一定意义上说，本书是在研究“八年研究”报告的基础之上进行和完成的。不过，由于资料内容太多，工作量太大，时间紧迫，笔者也只是认真判读了其中的大部分章节，可能会带来一些认识上的偏差和误解。这有待

于今后对课题进行更翔实和深入的研究。

此外,还有一些单篇或专题性的文章和报告也对实验研究过程中的某项内容进行了论述和反思。这些研究既是对“八年研究”的早期探索,也是以后研究必不可少的第一手材料。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特别是美国逐渐开始出现了“八年研究”的专题研究。1951年,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曾任进步教育协会执行委员会负责人的瑞德福(F. L. Redefer,)撰写了博士论文《八年以后的“八年研究”——三十所学校实验研究》(*The Eight - Year Study - Eight Year Later: A Study of Experimentation in the Thirty Schools*),这是美国教育理论界第一次出现较为全面的以“八年研究”为主题的研究,特别是作者曾参与了实验研究的部分工作,而最终又对实验研究持否定态度,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作者全面分析了“八年研究”的原委与过程,特别是介绍了实验研究与进步教育、进步教育协会的关系,同时强烈质疑了“八年研究”的结果。这篇论文为本书提供了新的视角,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1953年,艾金在“进步教育”杂志上发表了《“八年研究”:假如重新再来》(*The Eight - Year Study: If We Were to Do It Again*)一文,论述了实验的重要价值和现实意义,回击了一些无端的指责,同时也反思了实验研究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进一步丰富了实验研究所蕴含的理论意义,可以帮助人们全面认识和正确理解“八年研究”。1961年美国教育史学家克雷明出版的《学校的变革》一书,系统介绍了美国进步教育的产生与发展,并由此获得了“班克罗夫特奖”(美国历史研究奖),^①书中运用大量史料深刻地阐述了学校的变革与社会的关系,专门介绍了进步教育协会及其著名的实验研究活动——“八年研究”。《学校的变革》为本书开阔了研究思路,特别是关于“八年研究”与进步教育的关系,为笔者明晰了一条正确的研究路线,书中所提供的大量相关研究文献也为进一步收集资料带来了方便。美国教育史学家布鲁巴克(J. S. Brubacher)于1966年出版了《教育问题史》(*A History of the Problems of Education*)一书,虽然书中并没有直接提及“八年研究”,但其中的“中等教育”一章以“中学与大学的衔接”为题,论述了美国中等学校的演进和大学与中学关系的发展脉络,从另外一个角度为本书拓展了思路。

^① 班克罗夫特(George Bancroft, 1800—1891),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传统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被誉为“美国历史之父”,代表作是10卷本《美国史》。